

周秦文明論叢

第二輯

段德新 主編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周秦文明論叢

第二輯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编

段德新 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秦文明论丛. 第二辑 / 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80736-431-3

I. 周… II. 宝…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周代—
文集②文化史—研究—中国—秦代—文集 IV. K224.03-53
K23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27157号

周秦文明论丛 (第二辑)

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433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431-3

定 价 60.00元

主 编：段德新

副 主 编：张亚炜 李 岐

编委会成员：李郁宏 任雪莉 王 竑

赵 峰 冯长哲 李新秦

李海菊 李翠香 马继军

崔睿华

吉金铸就的文明（代前言）

段德新

火的诞生，把人类带到了进入文明的门槛之前，而用火烧制的陶器则把人类导引进早期农业文明时代，含有金属成分的矿物质被烧火开荒、烧烤食物的烈火熔化后产生了铜器，又把人类推进到了青铜文明时代。青铜器的产生和使用最早是在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和伊朗，在我国使用青铜的历史则是在夏代。陕西姜寨仰韶遗址的铜片，甘肃东乡出土的铜刀就是那个时代的重要遗存和历史见证。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最为辉煌的时期，它作为人类较早运用冶铸技术在生产，生活，军事等领域大范围使用的珍贵金属材料，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前进道路上，繁荣辉煌了1500多年，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至今还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宝鸡这块沃土，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人类居住和繁衍生息的圣地。渭河两岸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达30多处，如著名的北首岭遗址，近几年发掘的关桃园遗址。夏商周三代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的青铜时代。周秦两大王朝在宝鸡这块广袤肥沃的大地上肇基，建立和奠定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据长期在宝鸡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北京大学的专家统计，从清道光初年到2000年一百多年来，仅周原核心地区岐山扶风交界处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123个，出土有商周青铜器的墓葬55个；仅1820年到1949年，这个地区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多达112件，从1949年到2000年周原遗址就至少出土了54批277件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在这389件当中，铭文50字以上的达72件。在周原遗址边缘的眉县杨家村，从1957年到2003年就先后出土过4次西周窖藏青铜器51件，其中有重要铭文的多达37件。就氏族邦国的青铜器群而言，地处渭河之滨，秦岭北麓的强国墓地一次考古发掘就获得37组1845件青铜器，其中有文字符号的达100多件。自2003年眉县五位农民发现和保护27国宝青铜器以来，到2006年先后有12批农民群众发现保护和交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青铜文物。在宝鸡这个神秘的圣地上，从汉代至今出土三代青铜器延续时间之长、出土器物数量之巨、所出器物上铭文数量之多、铭文内容史料价值之高、都堪称全国之最。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西周礼制的象征，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数千年传承不息的载体。其上不仅浇铸着那个时代先民血与火的倾诉，铸刻着殷商人狞厉神秘的面容，体现着周人包纳百川，以德治国的礼乐制度。据传当年大禹铸鼎时，因他治水走过九州的山山水水，便把沿途所见过的禽虫鸟兽铸于鼎上，作为图腾，遍告世人。这种数千年前的原始冲动，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几千年来，

鼎一直被视为国家政权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以至在近现代,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新疆建区纪念”时赐给的礼物也都是十米左右的大铜鼎,甚至于在联合国百年庆典时我国政府送的礼品也是大铜鼎。2007年5月,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七十多岁高龄的研究员陈佩芬先生,非常高兴地告诉笔者:你们宝鸡真了不得,有何尊、墙盘、折觥、逯盘这么多顶级国宝,我最近统计了一下,全国仅有的西周时代的圆鼎高度在70厘米以上的10个,1米左右高的大鼎当中,有一半出自你们那里。回来以后,我即对陕西历博、甘肃省博、辽宁省博、首博、上博、西安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江西省馆、台北故宫等馆藏西周和殷商时代的青铜大鼎进行了粗略统计,在仅有的35件高五十公分以上大鼎中,宝鸡一地就出土了12件,陕西关中出土的达18件。可见图强创新的周人就是在这里把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文化推进到了巅峰。大量出土的青铜器,以其精美绝伦的风采,使全世界都为之折服。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在为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作的序言中说到:“人类古代发明的源头在中国”。“中国古代以生铁为基础的钢铁技术恰恰是现代生产所采用的工艺系统相一致”。他还引用了国际冶金学权威克里尔的话说:“即使把美国和欧洲第一流的技师集合起来并使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不能做得比殷商青铜器好”。罗伯特在他的书中写到:“如果没有人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那些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也不能有骑士时代。”

周秦文明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和源头,而且还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仍然充满旺盛生机活力的主要动因。周人创造的“礼乐”文化,不仅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极力倡导的“克己复礼”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学问,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现实生活中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时刻都与三千多年前的周人形影相随。再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这就是鲜明的中国特色所在。秦人创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及许多管理国家的制度,也是我们今天在多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十三亿人口泱泱大国构建和谐社会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组织动员全社会的研究力量,从历史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角度,揭示周秦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化语义及其王朝兴衰的内在原因,探寻在风云激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我们民族振兴的契机,努力发掘每件青铜器上的历史文化因子,为今天的现代文明建设服务。

周秦文明产生于宝鸡,宝鸡地区具有研究和开发利用周秦文明成果的先天优势、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这就迫使我们宝鸡人当仁不让的高举周秦文明学术研究的旗帜。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建馆50年,特别是新馆开馆十年来,我们非常珍惜老祖宗恩赐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得史独厚的绝对优势。2003年已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周秦文明学术研讨会,时隔五年我们又在这里举办2008中国宝鸡周秦文明研讨会,群贤毕集,共同探讨周秦文明的方方面面,解读周人和秦人开拓创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文明社会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这次研讨会得到全国文博界和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论文37篇,还有好多专家发来了他们精心酝酿的论文题目或内容提要。许多年事已高的著名老专家送来了他们的倾心力作,也有许多周秦文明研究的后生晚辈积极参与。更令我们欣慰的是一支年轻的周秦文明研究方面的专家队伍也在茁壮成长。在目前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背景下,宝鸡地方政府非常看重当地的文化遗产,不仅把它作为对外交流的珍贵名片和促进地方经济,

政治,社会三大文明发展的助推器,还作为陕西省周秦汉唐四大文化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 2006 年市政府下决心斥巨资在石嘴头遗址建设以 35000 平方米的青铜器博物院为标志的石鼓文化公园,目前,主体工程已近尾声。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广大专家的大力支持,有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有藏量丰足至今仍然迭出不穷的文物资源,我们一定会高扬周秦文明研究的旗帜,把周秦文明研究的学术品牌打造得更加响亮。

附录:部分博物馆藏殷商和西周出土的 50 厘米以上大鼎统计

编号	名称	时代	出土地点	收藏单位	通高 (cm)
1	42 年迷鼎甲	西周	陕西眉县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51
2	吴王姬鼎	西周	西安市征集	西安博物院	52.5
3	多友鼎	西周	陕西长安下家村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51.5
4		西周	辽宁喀左北洞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	52
5	毛公鼎	西周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	53.8
6	兽面纹立耳铜方鼎	商代	江西新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	54
7	43 年迷鼎乙	西周	陕西眉县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53.6
8	禹鼎	西周	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	国家博物馆	54.6
9	兽面凤纹鼎	西周	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55.5
10	太保方鼎	西周		天津博物馆	57.6
11	43 年迷鼎甲	西周	陕西眉县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58
12	42 年迷鼎乙	西周	陕西眉县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57.8
13	兽面纹铜圆鼎	商代	江西新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	58.6
14	鬯鼎	西周	甘肃灵台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	60
15	鹿方鼎	商代	河南安阳出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	60.9
16	堇鼎	西周	北京琉璃河 257 号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	62
17	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	商代	江西新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	62.4
18	盗鼎	商代	河南安阳出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	66.8
19	兽面纹立耳铜方鼎	商代	江西新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	70.2
20	牛方鼎	商代	河南安阳出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	73.3
21	饗饗纹鼎	商代	陕西礼泉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77
22	虢鼎	西周	陕西眉县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77
23	德鼎	西周		上海博物馆	78
24	乃孙鼎	西周		台北故宫博物院	81.8
25	兽面勾连雷纹鼎	西周	西安长安新旺村出土	西安市博物馆	85
26	师夔鼎	西周	陕西扶风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	85
27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	郑州商城出土	国家博物馆	87
28	外叔鼎	西周	陕西岐山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89.1
29	大克鼎	西周	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	93
30	乳钉纹虎耳铜方鼎	西周	江西新干出土	江西博物馆	97
31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	郑州商城出土	国家博物馆	100
32	大孟鼎	西周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国家博物馆	102.1
33	淳化兽面龙纹大鼎	西周	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	淳化县文化馆	122
34	司母戊大鼎	商代	河南安阳侯家庄山土	国家博物馆	133

目 录

秦子盃与“秦子”之谜·····	李学勤 (1)
秦子簋盖补释·····	王 辉 (5)
“周公制礼作乐”与西周青铜钟的产生 ·····	李先登 (12)
再论王孟与莽京 ·····	丁 孟 (16)
铜器图录的编辑问题——以《周原出土青铜器》为例 ·····	游国庆 (21)
《逯鼎》铭的几个问题 ·····	郑 光 (35)
再说金文所见之益公——兼与韩巍先生商榷 ·····	杨亚长 (61)
四十二年逯鼎与册命制度·····	刘军社 (66)
从逯盘诸器铭文看西周单氏家族·····	张亚炜 (70)
丹江上游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关系试析·····	张天恩 (80)
秦君葬地蠡测——君王陵墓同都城关系探索之二 ·····	王学理 (88)
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及相关问题·····	辛怡华 (99)
先秦文武德宣穆诸公在宝鸡活动情况述略·····	李郁宏 (105)
周文化对戎狄、氐羌、巴蜀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	陈全方 陈 馨 (110)
从周公庙考古发现探析殷周礼制的关系·····	彭 曦 (116)
先周世系考·····	张 华 (120)
关于对扶风红卫村出土“列卣”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124)
梁带村西周木俑的清理与修护·····	雷 少 (130)
三门峡虢国国君虢公翰与“周二王并立” ·····	田双印 (135)
虢国名号之来源考·····	刘社刚 (140)
西周时期的人首管釜钺——兼谈西周铜钺的功能 ·····	高西省 (145)
关于三角援铜戈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李新泰 (154)
动物形青铜器与西周社会文化意义——从宝鸡茹家庄出土“孟铎”说起 ·····	陈丽碧 (158)

“牛尊”研习一得	熊建华	(168)
梁姬罐铭文试析及相关问题	李清丽	(172)
宝鸡出土的西周温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陈 亮	(176)
中国青铜器的辨伪	罗西章 罗芳贤	(182)
周原大型青铜器残片何其多——兼论西周的称量货币	罗西章 罗红侠	(187)
周原出土玉器简述	张恩贤 张晓军	(196)
岐山县博物馆收藏的秦代陶器考释	庞文龙 徐永卫	(208)
近年宝鸡虢国研究成果述要	李郁宏 袁 红	(214)
雍城秦汉瓦当制作方法的发展演变	景宏伟	(219)
从近年岐山北郭地区出土的文物浅谈凤凰山遗址的性质	王文耀	(224)
西周青铜法典的现实启示	段德新	(230)
宝鸡竹园沟墓地族属问题的再思考	王 竑 石 蓓	(237)
有关宝鸡戴家湾铜器族属及墓地性质的推论	任雪莉 李翠香 李 扬	(248)
铜镜源流与鉴藏浅说	胥孝平	(261)
西周历法纪时词合天、合历、合古训，重建明相历法新天	黄盛璋	(266)

秦子盃与“秦子”之谜

李学勤

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墓葬的发现得到报道之后，由于当时大家看到的青铜器多有“秦公”铭文，关于这是哪代秦公的探讨曾成为热点。后来，不少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可能也出自同地的“秦子”青铜器，就“秦子”的身份有一系列讨论。

有“秦子”铭文的青铜器，兵器如戈、矛早见于清代以来著录，礼乐器则只见于礼县的发现后才得看到，已知有钟、簠和盃。其中秦子盃一件，虽然有一些论作提到，且为王辉等先生收入《秦出土文献编年》的续篇^[1]，由于器传已流散到美国，实际很少学者能够目见。好在盃的照片已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所编《古代文明》上发表^[2]，使大家有了研讨的可能。

这件秦子盃通高 34 厘米，器身呈正圆扁体形。盖象四阿屋顶，各面中部有方窗，四隅有棱脊。盖顶钮作镂空伏鸟，鸟背又有一小鸟，鸟尾则以扣链与器盖相连。扣链共分三节，中间是顾首虎形，上下都是异兽。盖为龙形，有立雕镂空的角。流微曲，作缩足的兽形，前端有首。在器肩前方设一顾首伏虎，腹侧又有四只突伸的小鸟。腹面正中为很长的凸起圆锥，环以一圈大小相间的重环纹，外面再环以一圈斜角云纹，云纹间小珠也都凸起。腹下有四兽形足，足上端加以很大的鸟首。盃保存良好，通体覆有青绿色薄锈，从工艺的复杂、装饰的华美来看，达到了当时的极点，足以改变认为秦器质朴粗放的流行见解。

盃的铭文在近盖处的腹面外缘，系铸款，共两行十六字（包括重文两处），

秦子乍（作）铸用盃，其
迈（万）寿子子孙孙永宝用。

如以重文作一字计，就是每行七字。这一铭文，前半的格式与传出大堡子山的几件秦公鼎、簠的“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簠”一致。其“秦”字不从“臼”也彼此相同，“作”、“铸”、“用”等字均很类似，但和“秦”字有“臼”的秦公器差别明显^[3]。如与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钟比较，后者更为规整，如“宝”字的结构亦有些不同。

2005 年，我在论述秦子簠盖时曾引用陈平先生关于这类扁体小口盃的意见^[4]，他指出“有这种盃的组合是西周晚期周墓葬铜器组合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并举宝鸡姜城堡秦墓出这类盃，作为属于“与西周末年最为接近的春秋早期”的证据。后来梁云先生曾以秦子盃同一些时代相近的同类型器物进行对比^[5]。

我觉得,有下列几件扁盃可与秦子盃比较,有助于推定秦子盃的时代:

第一件是1976年陕西临潼西段村出土的王盃^[6]。该盃通高36厘米,有伏鸟形盖,系以扣链。盃上饰兽首,下有垂珥。流直,与盃同饰重环纹。腹面正中为涡纹,环以一圈斜角云纹,外再环以重环纹。腹下有饰有夔纹的四足。铭文是“王作丰姬单宝盘盃,其万年永宝用”,乃西周晚期周王为女所作。不管从形制还是纹饰来看,都可谓秦子盃一类器较早之例。

比上述王盃可能略迟的,是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所出佐盃(或称迷盃),其图像见《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久已脍炙人口。该盃通高达48厘米,有两翼镂空翘起的伏鸟形盖。扣链作虎形。盃上有兽首,下有卷珥。腹面中心为蟠龙纹,环以重环纹和斜角云纹,惟后者在外圈。流直,饰重环纹,前端有兽首。腹下有饰夔龙纹的四足。铭文为“逯(佐)作朕皇高祖单公□□考罍盃,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系周宣王时器。

其次是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入藏的盃。该盃通高达44.5厘米,有两翼镂空而翘起的伏鸟形盖,其上又有一小鸟。扣链为顾首虎形。盃有兽首及珥。腹面的两圈为重环纹、斜角云纹。腹下有四兽足。形制、纹饰均趋近于秦子盃,但流仍系直的。

1963年陕西扶风齐家村所出它盃^[7],通高37.5厘米。其伏鸟形盖也有镂空翘起的翼,但扣链简单。盃为顾首龙形,流微曲,呈缩足的兽形。腹面在涡纹外环以重环纹、斜角云纹。腹下四足上饰夔纹,与王盃相似。总的说来,比保利盃更接近秦子盃。

还要提到1993年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31号墓发现的一件盃^[8]。此盃高34.6厘米,伏鸟形盖,扣链作顾首虎形。盃上有兽首,流弯曲,前端也有兽首。腹面中心为蟠龙纹,环以重环纹、斜角云纹。腹下有两人形,叉腿仍成四足。31号墓主系晋献侯夫人,献侯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故该盃也必为宣王时所作。

作为参考,还可举出河南三门峡上村岭2001号墓的盃^[9]。此盃高22.6厘米,盖上为蟠龙形钮。盃上有兽首,流弯曲,前端有兽首。腹面中央为蟠龙纹,环以一道斜角云纹。腹下为人形足。2001号墓的年代,报告定作西周晚期,或许可稍后一些。盃的形制、纹饰与秦子盃距离略远,但仍在大的范围之内。

以上这些可资对比的器物,基本上都属于西周晚期,即使个别晚一点,也应在两周之际。秦子盃由各种因素考虑,都与上述各盃接近,唯一应该推为较晚的,是其装饰更为繁复,工艺更为发达。因此,秦子盃排在东周初年,或者说春秋(用广义)早期前段,是合理的。

比秦子盃更晚的,如学者所指出,有圆顶山98LDM1的盃^[10]。那件盃高31.5厘米,四阿形盖,四隅有伏兽,盖上有张翅的伏鸟,四角又有小鸟。扣链作顾首虎形,下连一熊。盃上有兽首和小兽,下面有扉棱。流弯曲,作缩足兽形,其上肩部再设两小兽。腹面中央为涡纹,环以两圈细“蟠虺纹”,同样细密的花纹还遍布于盖面器肩等处。腹下有伏兽及人形足。差不多相同的另一件出于98LDM2,高32厘米^[11]。这两件盃保存着秦子盃等的若干因素,是肯定的,但作为其主体花纹的“蟠虺纹”却是秦子盃完全没有的,彼此间无疑有相当长的时代距离。如果说圆顶山盃已属春秋中期,秦子盃置于春秋早期前段应正合适。

前面提到的梁云先生论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论证了“秦子”是特指一个人。他说:“秦子诸器的年代既然如此集中,‘秦子’就应是秦国历史上的某个人,而不会是多

个人的共用称呼，否则器物的年代就会很分散。^[12]这是很正确的。

推断“秦子”是什么人，应该说所能依据的材料尚欠充分，比如秦子簋只见盖上的后半铭文，文字尚有残泐；秦子钟更有待正式发表，才能确定其铭文的内容。目前在学者间已产生三种看法，即襄公、静公和出子。

“秦子”为襄公未受周封为诸侯以前称号，此说最早出于晚清的陈介祺，他在为秦子戈作跋时说：“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为诸侯，此曰‘秦子’，或襄公之器与？”^[13]现在从“秦子”各器的形制、纹饰考察，以之为襄公受封以前所作，失之过早。秦子簋铭有“時”，也和襄公受封后始作西時的记载不合^[14]。

出子说最为流行。按《史记·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出子之立在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考虑本文前面的讨论，似乎失之过晚。我曾谈到，秦宪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壘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当时出子应称秦公，没有理由贬称“秦子”，也不会有人预见他不久便被三父等宫人贼杀，不能由于他后来谥为“出子”便同“秦子”联系起来。况且《秦始皇本纪》明载出子“居西陵（或作西陂）”，“葬衙”，并不葬西垂。

秦子簋盖铭云：“秦子之光，昭于闻四方，子子孙孙，秦子姬用（？）享。”根据金文通例，秦子是器主，“秦子、姬”兼及其夫人，这是讲秦子和夫人子孙用该器祭享，不可将“秦子姬”理解为受祭者。“秦子姬”也不能理解为“秦子”之母姬姓，因为古时没有这样以子系母的称谓体例，不会这样称呼出子母鲁姬子。

“秦子、姬”和太公庙秦公罇、钟的“公及王姬”文例相同，都是夫妻合称。对此有所误解的起因，是过去林剑鸣先生关于罇、钟的看法。那时他认为铭中的秦公是出子，又考虑到出子五岁即位，仅六年而死，不可能有妻，于是说：“照春秋时的礼制，国君与王后不可能相提并论，……而这里‘公’和‘王姬’并列，显然因‘王姬’的地位是很高的，她只能是‘秦公’的母亲。据《史记·秦本纪》载：出子被立时只有五岁，被杀时只有十岁，这样年幼的国君，由母后临朝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这个‘王姬’肯定是宪公的夫人，出子之母。而只有国君同母后才能与‘公及王姬曰’的口气相吻合。在宪公以后，只有出子才有母后临朝的可能，故此钟、罇上的铭文‘秦公’即为出子无疑。^[15]”这一看法的问题是古时也不能把母列于子后。移用到“秦子、姬”，同样不能说是出子和其母鲁姬子。

如果将“秦子”释为文公未继位而卒的太子静公，便没有上面说的几个问题。这个看法，是陈平先生在1986年即已提出来的^[16]，曾为吴镇烽先生所支持^[17]，前些时我也作了一些引申^[18]，认为从现有材料看是最可取的。至于秦子簋铭内有“受命”字样，原句是“秉德（？）受命纯鲁”，我已说明应参看疾钟的“受（授）余纯鲁通禄永命”^[19]，和受天命、受大命无关。

随着有关材料的进一步辑集刊布，以及田野工作的深入扩展，相信“秦子”之谜不久即将得到解答。

注 释：

[1] 王辉、杨宗兵：《〈秦出土文献编年〉续补》（三），第2841页，《秦文化论丛》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 [2] 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图二.3,《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 [3] 参看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第164~165页,(台)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
- [4] 萧春源:《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李学勤“前言”,澳门基金会,2006年。
- [5] 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第302~303页,《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 [6] 李西兴:《陕西青铜器》,第19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 [7] 同[6],第199页。
- [8]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第124~12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第6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0] 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二二,文物出版社,2004年。
- [11] 同[10],二三。
- [12] 同[2],第305页。
- [13] 陈介祺:《簠斋金文题识》,第7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4] 同[4],第8页。
- [15] 林剑鸣:《秦史稿》,第5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6] 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 [17]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第186页,中华书局,1987年。
- [18] 同[4],第8~9页。
- [19] 同[4],第6页。

秦子簋盖补释

王 辉

秦子簋盖收藏于澳门萧春源先生珍秦斋，是近年所见春秋早期秦国极为重要的铜器。簋盖有铸铭 8 行 40 字（含重文）。文字铸范不精，又多锈蚀，本不十分清晰。2002 年、2004 年，我两度途经澳门，得于萧先生处摩挲原物，推敲文字。稍后曾作小文，但因有些问题难于论定，久置篋中。近日，李学勤、董珊两位先生作文^[1]，对簋盖铭文作了深入独到的研究，读后深受启发，但我也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今刊发此文，与二位先生及相关学者讨论。

释文：

……時。又（有）嬰（柔）孔嘉，
保其宫外。显（温）
龔（恭）□秉□（德？），受
命屯（纯）鲁，義（宜）其
士女。秦子之
光，邵（昭）于□四
方。子=孙=，秦子、
姬□（用？）享。

如李、董二位先生所说，原铭应自器铭读起，器盖连读，“時”属上句。

出土文字出现“時”字，以此簋盖为最早。《汉金文录》1.25 著录“好時共（供）厨金鼎”^[2]，已是汉器。《说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从田，寺声。右扶风有五時。好時、鄜時皆黄帝时祭（《韵会》祭作筑，王筠《句读》及段玉裁注本据改）。或云秦文公立也。”所谓“黄帝时祭”，乃据传闻，并非事实。《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騊駼、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是襄公时已立時。此事又见《史记·封禅书》。《封禅书》又云：“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簋盖铭有“時”字，证明春秋初秦人已立時，司马迁的说法可信。许慎晚司马迁约 200 年，对春秋秦人立時的时间、名称，已有不少误会。

“又嬰孔嘉”。“又”读为有，“嬰”读为柔。《说文》：“嬰，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段玉裁注：“《诗·大雅》作猱。毛曰：‘猱，猿属’”徐锴《繫传》：“嬰，今作猱。”“有柔孔嘉”即柔嘉，谓柔和而美善。《诗·大雅·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唐陆贄《册

淑妃王氏为皇后文》：“柔嘉自持，喜愠莫见。”柔嘉可用于男性，亦可用于女性。

“保其宫外”。《说文》：“保，养也。”引申为居。《诗·唐风·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郑玄笺：“保，居也。”古时太子居东宫。《诗·卫风·硕人》：“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毛传：“东宫，齐太子也。”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又《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这虽说的是民间的情形，但贵族也是当遵守的。由此而论，若器主（秦子）之父是太子，居东宫，则器主早年可能居于宫外。

“𡗗”字作，从皿，声。旧释，读弘，不确。殷墟甲骨文作，地名。《粹》979：“壬午[卜]，贞：王[其]田孟，亡戕（灾）？戊子王其田旂，亡戕（灾）？辛卯卜，贞：王其田？，亡戕（灾）？”刘桓《殷契新释》^[1]说距孟、榆、旂不远，应即今河南温县。徐郊尹鼎：“良圣每（敏）……”何琳仪首字隶作，读为温^[4]。《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以得之。”“温恭”即“温良恭俭”之缩语。此词春秋器铭习见，王孙遗者钟：“余𡗗（温）龔（恭）猷（舒）迟，𡗗（畏）𡗗（忌）异趯趯”，肃愆（慎）圣武，惠于政德。“𡗗”下一字残缺已甚，李学勤先生说是“穆”字，从文例看，其说或是。“秉”下一字，依文例应是“德”字。晋公盆：“敢帅井（型）先王，秉德嬖（秩）（秩）。”秦公及王姬罍：“穆穆帅秉明德。”者刃钟：“女（汝）亦虔秉不经德。”

“命”即天命。古君主每以受天命自居。《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诗·商颂·玄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郑玄笺：“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师匭簋：“不（丕）显文、武，雁（膺）受天令（命）。”迷盘：“……文王、武王达（挹）殷，雁（膺）受天鲁令（命）。匍（溥）右（有）四方，并宅𡗗（厥）堇（勤）疆土，用配上帝。……成王，成受大命，方狄（剔）不享……”^[5]秦公簋：“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𡗗（宓）宅禹责（迹）。十又（有）二公，才（在）帝之𡗗（坏），严龚飡天命。”屯读为纯。《尔雅·释诂上》：“纯，大也。”《方言》：“纯，好也。鲁，嘉美。”“纯鲁”近义连用。

“义”读为宜。史墙盘：“义其湮祀。”者刃钟：“𡗗（惠）安乃寿，勿有不义。”《说文》：“宜，所安也。”引申为使安辑。《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毛传：“宜安民，宜官人也。”陈奂传疏：“传必释之者，因末二章皆言成王之能官人，末二句又带及安民之意，而与泛言民人者不同故也。”“士女”本指成年男女，《尚书·武成》：“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黄，昭我周王。”“士女”可以指夫妻，如庆叔匜：“庆叔乍（作）媵子孟姜盥匜，其……男女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男女”即“士女”。引申指人民、百姓。师寰簋：“𡗗（驱）孚（俘）士女羊牛。”《后汉书·王畅传》：“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三国志·崔琰传》：“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宜其士女”意为使人民安辑。

“邵”通作“昭”。颂鼎：“王才（在）周康邵宫。”“邵宫”即“昭宫”。《山海经·西次三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偕于昭宫。”昭读为照，《集韻·笑韻》：“照，《说文》：‘明也。’亦省。”《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惠洽椒房，恩昭九族。”昭、照义为光耀。颶羌钟：“赏于韩宗，令（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秦公簋：“乍（作）𡗗宗彝，以邵皇且（祖）。 ”

“于”下一字，残损不清，李先生说是“婚”字籀文𡗗，读为闻。董先生“据残划猜想，或可能是‘夏’字”。殆以后说为近是。“闻于四方”固然见于徐王子旉钟，但“系指钟声而言”，“光”则不宜称“闻”；再说“照于闻四方”，“闻”置于介词“于”后，亦罕见，夏指华夏，亦即中国。秦公簋：“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大命，甬（宐）宅禹责（迹）……虢事𡗗（蛮）夏。”秦公一号大墓编磬（85 凤南 M1：495+549+517）：“……天命，曰：窳（肇）尊（敷）𡗗夏，极（亟）事于秦。”秦人自以为与夏同祖。《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张守节正义：“（颛顼）黄帝之孙，号高阳氏。”秦公大墓编磬（85 凤南 M1：300 与 1982 年出土一残磬缀合）：“高阳又（有）灵，四方以甬（宐）平。”^[6]“夏四方”即华夏四方，亦即“禹迹”、中国宇内。秦子之光，照于华夏四方，此“秦子”显然已把自己看成华夏诸侯。还有一种可能，此字从残划上看，也可能𡗗是（蛮）字。秦武公及王姬铸钟：“虢事𡗗方。”“𡗗”字作𡗗，上部接近。春秋早期，秦僻处西戎，“蛮方”即指西戎。秦子之光，照于西戎，也是合乎当时实际的。“蛮方”、“蛮四方”意义接近。

“秦子姬”是两人还是一个人？李先生认为是两人，“即器主秦子和其妻姬姓”，如同寰盘之“郑伯、郑姬”，寰鼎称“郑伯、姬”。董先生认为是一个人，其“称谓方式，应是‘母以子贵’的产物。这种称谓虽然在文献中难于找到类例，但并不难理解”。我赞成李先生的说法。先秦女子命名习惯，或单称姓，如虢仲鬲：“虢仲乍（作）姑鬲鬲。”仲白父簋：“仲白父乍（作）好旅簋。”姑、好皆姓；可在姓前加伯、仲、叔、季，如“孟姜”、季“姑”、“孟妨”（伯元匜）之类；可在姓前加母国名，如“京姬”（善夫吉父鬲）、“邾嫫”（曹，杞伯每亡鼎）；或加夫国氏，如仲伯壶：“仲伯乍（作）亲（辛）姬𡗗（蛮）人媵壶。”辛为夫家国氏。如是亡母，或称“文母”，如静簋：“用乍（作）朕文母外姑鬲簋。”或直称姓，如师西簋：“用乍（作）朕文考乙伯、寃（宫）姬鬲簋。”或在姓前加谥号，如鞫铸之“圣姜”、师趯鼎之“圣姬”。照此分析，“秦子”与“姬”只能是夫、妻的关系。古有夫妻自作祭器之例，如猷叔鼎：“猷叔，佗（信）姬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女子有于姓前加丈夫尊号者。如“王姜”（作册矢令簋），“王姒”（保侃母壶）、“公姑”（公姑鼎），王、公皆夫之尊号。说“秦子姬”是在女姓前加子爵，董先生也深知“在文献中难于找到类例”，但又说“（这）不难理解，”是不大说得通的。

秦子簋盖的时代，李、董二位先生对其器形和纹饰作了讨论，皆定为春秋前期；但“秦子”究为何公，则意见不一，李先生以为是文公太子静公，董先生以为是出子。董先生的看法同我多年来的看法一致，但具体到本铭，则不一定合适。正如李先生所说，“秦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不可能有姬姓之妻。但李先生的静公说，似乎也不合适。由本铭看，“秦子”的认定必须符合 4 个条件：1. 幼年长于宫外；2. 承受天命；3. 其光照耀宇内，在秦史上必有较大影响，是有为之君；4. 其妻为姬姓。静公是文公太子，《史记·秦本纪》说：“（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赐谥为靖公。靖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静公未即君位，其称公是文公所赐，甚或其子宪公即位后所追认，其生前只是太子，不是公。秦公及王姬铸称“刺（烈）刺郤（昭）文公、静公、宪公不豢（坠）于上……”铸为武公所作，武公是宪公子、静公孙，铸称“静公”并不能说明其生前称公。古太子居东宫，《诗·卫风·硕人》：“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毛传：“东宫，齐太子也。”可见太子静公幼居

“东宫”，不居“宫外”。承受天命者皆为君主，太子静公生前其父文公尚健在，即称自己已受天命，有僭越之嫌。又日本 MIHO 博物馆藏秦子钟（详下）铭称：“秦子畹鞫才（在）立（位）”，“在位”分明是“在君位”，与秦公及王姬罍钟同，也显然与静公生前未即君位的情况不符。静公死于文公四十八年，不会很年轻，也可能帮文公做过一些事，但文献毫无记载，无从判定其在秦史上有较大影响。即令有，父亲尚在，就自称自己“光照于四方”，恐非人子所宜。静公肯定有妻，但是否姬姓女子史无明文。由以上分析看，说簠铭“秦子”是静公，理由并不充分。

我以为，秦子簠盖和 MIHO 秦子钟的“秦子”极可能是宪公，其理由是：

1.《史记·秦本纪》云：“靖（静）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为宁（宪）公。”《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官。”这虽说的是民间的情形，但贵族也当是遵守的。宪公是文公太子静公之子，父为太子，居东宫，则他在位即位之先，宜居东宫之“外”。

2.《秦本纪》又云：“宁（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关于“荡社”，《史记》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李学勤先生也说：“荡社”即“唐杜”，亦即《金璋所藏甲骨卜辞》611“作大邑于唐土”之“唐土”，是陶唐氏（尧）之后，以唐为氏，迁封于杜^[7]。“荡社”为夏、商后裔封国，在今西安附近。宪公居平阳（今陕西岐山、眉县、宝鸡、凤翔四县交界处），攻灭“荡社”，势力已深入旧西周腹地。又《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又：“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已归。”芮本殷商姜姓国，大约在周武王时，已改封姬姓。《尚书·顾命》有“芮伯”，与召公、毕公并列，地位甚高。《逸周书·芮良夫》：“芮伯若曰……”出土文字及古文献凡称“某某若曰”的，其人多为王或执政大臣，如周公、伯和父（共伯和），芮良夫可训诫周厉王，其地位之尊贵可见。《诗·大雅·桑柔》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毛传：“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芮旧说在今陕西大荔县东（老朝邑县）^[8]，其疆域也可能延至今韩城市^[9]。芮伯万被逐，“出居于魏”，杜预注：“魏国河东北县。”即今之山西芮城县。芮在黄河两岸，芮国内乱，芮伯万受到魏国的保护，宪公执芮伯以归，可见秦势力已强，可以插手三晋势力范围以内的事务。说此时“秦子之光”照耀于华夏、蛮戎地域，恐也不是过分夸大。

3.《秦本纪》：“（宪公）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宪公有二位夫人，出子之母为鲁国姬姓女子，“出子”可能是“庶出”之子^[10]。又秦公及王姬罍钟：“公及王姬曰：余小子……”“公”为武公，“王姬”为周王之女，武公、德公生母，宪公正妻^[11]。武公“初即位时也仅十一二岁”，“由母后临朝也是很自然的”^[12]。宪公正妻、媵妾皆姬姓女子，在其即位初，夫妻并称“秦子、姬”，是恰当的。

“秦子”是谁？这是研究秦文字的学者多年来久争不决的问题。二十年前，陈平先生最早提出“秦子”是文公太子静公^[13]；我则以为“秦子”是初即位的秦君，宪公、宣公、前出子都有可能，而可能性最大的是出子^[14]，这一说法，得到很多同行的赞同，董先生文采用此说，李先生也说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后来陈平的看法有所改变，以为“秦子”是